

村四楼上课的日子

——怀念恩师陈从周先生

刘天华

浪迹天下十三年后，1979年秋，我又回到同济拜在陈先生门下，研读古典园林。那时先生刚刚六十出头，精力充沛，三年中又只带了我一个学生，又正好与其长女同岁，先生待我如子侄辈，故我得以常常亲近先生，侍奉左右。今逢先生100周年纪念，想说的话真不少，还是从国画课说起吧。

有趣味的国画课

1979年春天，我报考了先生中国建筑史专业古典园林研究方向的研究生。考试科目中指明了报考园林专业要考中国画，我对此有点发懵，于是借一次出差上海的机会，和同学一起去同济新村村四楼拜访陈先生。说明来意后，先生让我们坐进了他的饭厅兼书房，我忐忑地问，中国画范围极广，应该如何准备，如何应考？记得先生一面抽烟，一面笑眯眯地说：“不会考你山水人物，主要是画一些园林中常见的小景，如竹木泉石，搞园林的不会画几笔国画可不行。这是我坚持要考的。”还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与建筑史、园林史、绘画史、古文翻译、古文作文放在一起考。最后先生还说：“做我的学生，知识面一定要广，我个人有点怕，其实不难的，就是杂了一点，看你底蕴了。”出门告别时，我一身冷汗。

以后的半年里，我找了一位国画老师恶补园林小品小景，因为有大学三年素描水彩课的基础，画得还马马虎虎。考试转眼就到了，因为要考设计，考场设在同济南楼底层的绘画教室里，一人一张大桌子，综合科目考卷有三大张，还夹着一张一尺见方的宣纸。当我答卷试题拿准准考证上要求准备的笔墨砚时，周边考生都投来奇怪的目光，连监考老师也觉得新鲜。题目是“枯木竹石图”，按照准备的腹稿提笔画。因为紧张没有发挥出最佳水平，不过幸运的是先生后来还是收了我。

先生是画坛巨匠张大千的人室弟子，跟先生学画，受他教化的“画青”少说有十几人。但是按照研究生教育大纲授课，正儿八经教的唯有我一人。后来和年轻一辈说起此事，还真有点小得意。可惜我悟性不高，没学好，想想真是愧对老师了。第一学期有国画课，每周四节。上课时，会先让我把饭桌擦干净，铺上毡毯，然后裁纸研墨。有时先生一边抽烟一边嘟哝：“小赤佬，上我的课还要我倒贴宣纸，以后拿点来。”但我好像一次也没有带去过，因书桌上、墙角边一卷一卷宣纸堆了不少，都是请他作画的人送来的，用也用不完。

上先生的课很随意，他常说：“我带学生是老师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我说，你画，你能领悟多少，全凭自己的本领。”还时不时感慨：古人所谓“师法其上，得乎其中”，诚不我欺也。有时我会提出质疑：“如果学生都如此，岂不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此时，先生就会瞪我一眼，骂一句“小赤佬，懂懂啥！”过后想想，跟着先生这样一位诗、书、画均是高手的园林大家，能得其中，已是上上大吉了。

其实先生教授画，还是很有章法的。他让我一开始先练三种线条：直线结合画竹竿，要把直幅画横过来，一节一节从左到右，越来越细；曲线是画兰花叶子，先生称之为“撇”，下笔要随意，自由飞舞；圆是大大小小的圆圈，画葡萄、枇杷、葫芦就用此法。先生要求我回到宿舍，三种笔法要重复练上百次，如对待小学生一般，当然他也从未查过。国画课先生示范技法很是认真，他前后曾给我十二幅小品画稿，都是留存画稿中的精品。一次先生教我画山石皴法，随手取来一张作远山皴法示范，后来说到太湖石，又把纸颠倒过来画了一座石峰，我看后爱不释手，一直留到今日。虽不是完整画作，但画稿记录了先生上课之过程，对于我，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国画课的另一教学方式观摩，即看先生作画。求先生字画的人很多，学校外事部门又常将先生画作赠予外宾，因此先生有不少时间花在画画应酬上。作画时，边上要有书童做研墨、拉纸、铃印等辅助工作，这也成了我学画实践的一部分。这里还要说说先生的闲章。先生喜欢各式各样的图章，集有一大盒，印文各式各样，如“画奴”、“我生戎马”、“我与阿Q同乡”、“粹翁九怪”等，不少求画者还指定要盖这些深意味的闲章。先生题画也多有意味。记得有一次先生画葡萄，上题“一圈一圈何时了，谁都跑不掉”，左看右看十分得意，当时我不太领悟其意，后来才逐渐品出其中之蕴含。

先生交友极广，上门拜访的人也很多。我因隔三差五往先生家跑，能碰到不少名人。我现在还留有冯其庸先生一副对联，就是在先生家为他们写题，对于我，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随先生游历

读研两年半，最开心、最期待的事莫过于随先生外出开会、考察。除了第一学期公共课多，最后一学期论文较忙，中间大概跟先生外出了七八次，真是淡然旁人。那时经费少，出差一趟不容易。出差考察时每次就餐，先生和领导、老专家一桌，我喜欢挤在年轻人一桌，席间先生那一桌围着他聊天，笑声不断。先生博闻广记，风趣幽默，对各地的历史文化、名人轶事信手拈来，能说出不少道理，让大家在佩服之余又为自己的乡土骄傲。

到了晚上，先生似乎比白天更忙，他朋友多，仰慕者更多，所以宾客络绎不绝。当地文化、文博、古建、园林界的熟人、学生，一批接着一批。有时会让先生当场作画，分送众人。先生曾对我说过，他的画只送给有缘之人，有的人索画，他会不理不睬。而为他开车的司机、为他烹任的厨师同他要画，他一定会答应。记得先生有一方闲章，刻有“布衣陈从周”五字，他无官无职，一介布衣，在海内外有那么多朋友，实在是具有不一般的人格魅力。有人说陈从周喜欢骂人，不错，但他骂的都是那些破坏老祖宗留下的青山绿水和历史古迹的不懂文化的庸官奸商。对于一般劳动者，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先生从来不会横眉冷对，反而是和颜悦色，有求必应。

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起步，正是百废待兴，奋力前行之时，城市规划要重新制定。园林、风景区、古建筑都要评估和修复，这些会议都要请先生。另外，先生的《扬州园林》、《绍兴石桥》等著作文稿已初定，还要实地补充大量图片，我跟随先生左右，着实见证了先生的忙碌。先生勤快，出差途中也见缝插针写稿。我记得《书带集》中的《杭绍行脚》、《烟花过了上扬州》两篇都是先生挤时间草就，然后让我誊录。一篇是在西园宾馆开写，到镇江开会时定稿；一篇是在火车上完成草稿，我回学校帮抄的。先生说，这些都是文债，晚报盯着要。也就是这一篇一篇带有专业知识的抒情游记，造就了先生“散文大家”的名声。

时至今日，当年开会的内容多已忘记，但有些小事尚留在脑海中。第一次是去常熟开规划会议，我从外祖父曾在常熟中学教书，我从小对这座“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古城很有感情。跟着先生一路走来，每逢古迹残园，他都会指点精要，谈掌故沿革，如数家珍。还记得第二天一清早，五点不到就被先生从被窝里拉起，和朋友一起去言子墓附近喝茶的情形。先生说，喝早茶、吃汤面是江南古镇的传统，这种文化不能丢。另外还谈到燕园、赵园、曾园的保护修复，反正是问题一大堆，只能慢慢来。今天常熟已是江南文化名城，古园名胜保护得不错。先生当年的良苦用心和呼吁，应该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跟着先生游扬州两次，一次开会，一次为《扬州园林》补拍彩色照片。在扬州，先生朋友极多，旅游、园林、文博界以及市政府里都有，真正是高朋满座，少长咸集。带着一帮朋友，从扬州师院出发，坐着有点旧的工作船游瘦西湖，指点江山，先生是何等的意气风发。记得船过大桥时，先生吟出“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周围有人跟着唱和，从此我记住了王渔洋，记住了香影桥（大虹桥别称）。

写毕业论文

我的论文题目是“园林石峰研究”，主要研究古典园林中孤赏石峰品鉴鉴赏、历史沿革、现存状况等。关于选题，先生说过不止一次：写论文要立得住脚，题目要小，挖得深，就像在小河里抓鱼，把水抽干，把所有的鱼虾一网打尽。唯有如此，在学术上才会有机会发出声音。为我选定此题，可见先生良苦用心。其时正值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出版，我一看如获至宝，将中国美学讲得如此透彻，如此深入浅出，实不多见。有此一书，品评一章就较容易写了。难点是先生要我调查历代名峰在各地园林中还留存多少。所以就在上海图书馆坐了一个月冷板凳，仔细查找各种笔记、各种志书。

第二步是收集资料，江浙是重点，因为留存的古园较多。历史记载中有过名园的城镇，甚至乡村都要去，特别是到一些倒圯的废园中寻访石峰，还是很艰苦的。比较远的是去岭南和北京。先生人脉极广，出门前我总要去他那里领路条，是写给熟人朋友的字条，这比学校开的介绍信还要有用。例如去北京时，我就到单士元、朱家溍老先生家中拜访请教，还拜访了王澐、耿飚同等专家，对我在北京的调研帮助不小。

在准备论文的好几个月中，只要碰到问题，我都会去先生家里求教。他也不嫌烦，一边聊天，一边帮我解惑。记得有一次先生对我说：爱石蓄石是古时文人的普遍嗜好，故宋有《云林石谱》，明有《素园石谱》。但文房清供玩石，终究气派小，园林才是美石的最好归宿。白墙、竹影、梅花，水中倒影，都是石峰之绝配。后来我论文中就加了“石峰环境”一节。

最终，论文分为文字和图片两集。先生对成果形式要求极严：正文近四万字，要求我手写抄录，最后装订成古书模样；照片也要自己冲胶裁剪。这一阶段我吃尽苦头，不过最后，先生还是比较满意的，请他的两个好友给论文题签和刻印。一位是沪上书法名家王京镇，篆书尤为一绝。老生先在高校任职，去一次要大半天。因为和先生商定精装论文要十套，每本均要题签，一共是二十张。虽然笺纸很小，也着实让老先生吓了一跳，说陈从周把他当劳力来使。虽然小有不满，

但老人最后还是很认真地题写了。印文“积跬之作”也是先生定的，语出荀子的《劝学篇》，是对我的勉励，由贺平老师操刀。装帧完成后，黑色封面左上方的篆书题签和右下方红色的印文，让文本多了些书卷气，为论文增色不少。记得论文答辩时，看到桌上摆放着古色古香的文本，不少老师都啧啧称赞。

我的论文答辩会由园林界泰斗、南京林学院的陈植老先生任主席，还请到了大画家、苏州政协主席谢孝思老先生，谢老还给我留下了书画墨宝。这些全都是靠先生的面子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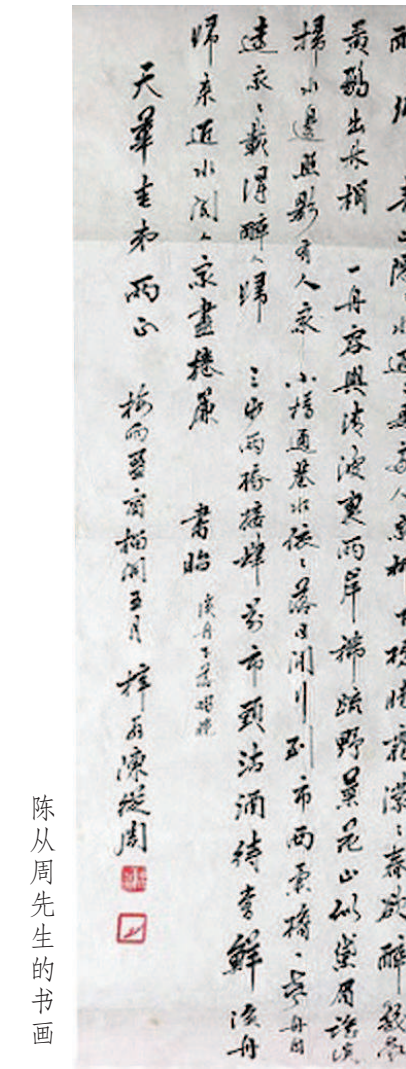
音容如在

九十年代后，先生因中风而行动不便。我因为帮先生编两本书，常去他家中。一本是《中国园林鉴赏辞典》，先生答应主持编写该辞典时身体尚可，并指定让陈门弟子共同参与，但因组稿工作量大，拖了近十年。先生谢世前此书刚刚付印，没能让先生看到成书，实为一大遗憾。另一本是《园踪》，是先生和其内侄一辈子收集整理之古代园记。稿子都为手抄本，有一尺来高。为寻求出版社而几经周折，最终还是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彼时两位老先生均已仙逝。

1993年春，上海电视台来我工作的上海社科院找我，说要拍一部系统介绍先生的纪录片，这是文化抢救工程的一部分。当时先生已得病，一切都必须抓紧，于是我放下手头所有工作，一心一意写剧本，几易其稿。纪录片原先取名“园林大师陈从周”，大家都觉得此名不亲切，有距离感，最后定名为“吾师从周”，由我弟子的口吻来讲述。因行动不便，先生出镜仅限于家里和豫园，其余外景则只能旁白。作为编剧，我跟着团队走了不少地方。最近至昆明安宁，又采访了几位先生的亲朋好友，从侧面来丰富先生形象。这次纪念先生100周年诞辰，将碟片送至学校前，我又看了一遍，内容尚满意，仅视频有点老，不够清晰。能为先生留下一段较完整的形象资料，还是很欣慰的。

回想起来，先生对我期望还是挺高的。在去社科院报到前，我去向先生辞行，先生送了他的第一本论文集《园林谈丛》给我，并提笔在书上写了“由来秀骨清，我生托子以命。天华从余游，适是书新刊，采杜诗赠之，谊见于斯矣，令我感动莫名。回头看看，实在汗颜，真的愧对恩师。

而今，我亦老矣，喜见先生学术在母校同济开枝散叶，想来诸位师弟和先生的再传弟子们一定会不断努力，开创陈学研究的新天地。



陈从周先生的书画



张香还先生在他的《音容宛在漫忆》一文（《文汇报书报》5月28日）中，忆及沈从文当时对素材平等的他的来稿中书写及个别措辞问题给予诚挚精辟的点拨，以及文章发表后又进一步帮扶的身受，令我唏嘘不已！

然而，往昔岁月的编辑、陈从文般循循善诱、“溢出”指导外，还真不缺乏气定神闲、敬业尽职者。一例：六十多年前，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发觉读一年级的胞妹殊有才华——所有她能吟唱的歌曲中的字词，不论出处，均可立即指哪认哪；间或打疙楞，一复唱，立即复活活恰。这一禀赋让我大感意外和佩服！那时，住家弄口有《大公报》贴报栏。我路过常瞅上几眼。于是，“去投稿”的念头油然而生。

真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来劲，不掂斤两，不揣深浅，把《大公报》与弄口屈委的黑板报等量齐观了：人家骆宾王七虚岁就写出色彩、音响、动静俱佳的《咏鹅》，我都读五年级了，还畏葸收手？于是，裁下几页练习本，拟了几个堪作硕博论文的弹眼落睛的标题：“论歌唱识字教学法”。一起笔，

即信马由缰、滔滔不绝、“文思泉涌”：由介绍家庭成员而就学校和师长，而胞妹才艺及伯乐者我的发现始末，而我对此法的功利效应的预期。我在闷热的阁楼小窗伏案奋笔，写了满满五大页！“雄文”寄出后，每天凝神于大名以铅印形式“突敬”。

一周许收到一封肥硕的印有报名的信。急急拆阅，抽出便笺，是一封毛笔书写，字迹工整的信，虽寥寥几行，因为那是人生首获之鱼腹，因而历久如新：黄柏生小朋友：你的来稿，我们看了，谢谢惠赐，你来稿中提到的歌唱识字教学法很新鲜。如果你有实际教学经验，欢迎整理后再寄来。我们再议。此复。……

读完，立即将这温文和气和、绵里藏

我有时会称丁景唐老为“老丁”，这并非不分长幼尊卑的脱口而出，完全是因为他来电中一向如此自拟家门，给我印象太深，而我也喜欢他像丁聪自称“小丁”那样的随意。很难想象这位乡音浓重、幽默风趣，亲切得使人毫无距离感的“邻家老伯”，就是主持编纂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曾“官拜”上海市出版局局长的大家……

现在，这位“犹恋风流纸墨香”的老人已翩然驾鹤西去；按一般说的那样是追寻老伴“王老师”去了。但我更以为两老是笑吟吟地在“纸墨香”中和先行一步的文朋诗友会面去了。

当年，我带着中学时的藏书《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第一次走进丁府请他签名。丁景唐先生执笔端书，边写边说：“我研究起步较早，但深度不够……”我很吃惊，作为全国鲁迅研究协会的理事，对一个普通的业余“鲁研”读者竟出如此自谦之言。后来他看到报上我以周氏兄弟笔法欣然反来的“休闲”轶事写的议论短文《无题》后，高兴地来电连连表扬：“写得好，写得好！”此后我才熟悉了他那待人宽严已严的标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古以来的人文习惯，只是在他的秉性中特别分明罢了。

和丁老的接触越来越多，不仅有与他的电话和书信往返，造访丁府更成了我最好的“充电”机会。说他是一本让我走进现代文学天地的活词典，恐怕并不为过。

丁老最后一次赠书给我是在2015年春。按厚度不到正编一半、篇末几页都有“写于华东医院”字样的《犹恋风流纸墨香》续集后，我与太太曾去疗养病房看望过他。这次探访正如我们多年来带着儿子去他家做客那样，只是有种莫名的感觉替代了当时的欣喜和欢快。他谈兴甚浓，不过有点精力不济。我们不敢久扰，早早就告辞了。在那个把小小时的探望中，他谈得最多的，还是最近写了什么和还想写点什么。其时，已是耄耋老者的他“犹恋风流”，依然洒脱。不知什么缘故，在这次实际成为诀别的会面中，我内心一直感到拘谨，那种在他面前从不曾有过的拘谨——我至今仍不解其故，难以释怀。

除了当面时敬呼他“丁老”外，逢他家人接听电话我总还是以“丁伯伯在吗”开头，因为我和同辈的言谈还有三祖言早早已成了好友，那种无拘无束的谈友。我想所有去丁府拜访过的人都会有这种良好的感觉——他们家风中那鲜明的毫无疑问就是这“无拘无束”；而这一氛围的营造者当然就是丁老本人。

每次趋访，一般都是由住客室间的言谈开门，如适逢言谈不在，就会由后门对窗的三姐先开窗应答，再来开门迎客。接着我们穿过灶间，拐弯抹角穿过

满是书堆的楼道拾级而上，在三姐“爹爹，有客人来了”的通报后，一起进入二楼阳光明媚的卧室兼书房，开始聆听他伴着爽朗笑声的谈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曾兴致高昂地用那“石刮挺硬”的宁波口音方言儿歌：“大大的小园，高高的矮凳，厚厚的薄刀……”，还有什么“一块洋钊叫‘温达拉’……”在愉快的聊天中时间过得很快，直到楼下高声呼唤：“爹爹，午饭好了……慢慢下来吧！”大家才余兴未尽地下楼，围着小八仙桌就座，开始了现已鲜见的三代同堂大家庭的温馨晚餐。开饭时总有人先说“阿爸阿妈，这鲜鱼你们先来尝尝”，等他和王老师动筷后大家再开吃。知道了老喜欢吃鱼，因此去丁府拜访时，我们多会在附近永嘉菜场挑选鲜活好鱼，然后拎着剖洗后的大鱼敲响他家的后门。

近年我因行走困难，虽和太太经常提起“去看看丁老吧”，但始终没有成行。其间虽也与丁老通过电话，但因他久已重听，难以交流，听到最多的是他带宁波口音说的“蛮好，蛮好”，后来又因为手机也很难接通，就连这“蛮好，蛮好”也不再听到了。我们只是在脑子里存着“去看看丁老”的念头，直到在朋友圈得知老人远行的消息。

翻阅书橱和文件筐留存的丁老赠书、信件和书刊文章的复印件，其中一纸复印件赫然在目：那是丁老2014年致函文汇报笔会“回音壁”的《关露与我》，是对《有愧的是我们——忆关露》一文中“二处不确”的“商榷”。由于作者引文疏忽，搞错了丁老与关露的关系，而丁老却顺作者之意写道：“我是一个幼失怙恃的孤儿，我有一位思想先进的小学教师的妈妈，把我抚养、教育。我把关露视作我尊敬和眷恋的姑妈一辈的有文化素养的长辈。”他高度赞赏此文“是一篇充满革命激情、伸张正义的好文章”，并向作者表示了感谢。在复印件上还有不知哪位的“评论”写道：“作者写错了关露与丁先生的关系，但文中丁先生并不纠正，认同了这个‘姑妈’，使我想起恩格斯对哈克纳斯与《城市姑娘》的评说……”因此他的结论是“太妙了”。而丁老本人则一语双关地加上了三字，曰“写得好！”

还有一册年代久远、由黄炎培自题封面的《延安归来》，是“民国三十四年”由“重庆国讯书店发行”的64开本口袋书。扉页有丁老手书的“此亦为历史名著，可看”。再换行顶格写上“宓儿 敏娘”，下署便是让我至今心头波澜难抑的“老丁”两字，当然也习惯地钤上了他的朱文私印和蓝色的日戳：1996年7月14日。提到此时时他说过“这也算是文物”了……

现在，岂止是这书，以上的一切都已成为我珍藏心殿的文物了。

现在，岂止是这书，以上的一切都已成为我珍藏心殿的文物了。



陈从周先生的书画

张香还先生在他的《音容宛在漫忆》一文（《文汇报书报》5月28日）中，忆及沈从文当时对素材平等的他的来稿中书写及个别措辞问题给予诚挚精辟的点拨，以及文章发表后又进一步帮扶的身受，令我唏嘘不已！

然而，往昔岁月的编辑、陈从文般循循善诱、“溢出”指导外，还真不缺乏气定神闲、敬业尽职者。一例：六十多年前，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发觉读一年级的胞妹殊有才华——所有她能吟唱的歌曲中的字词，不论出处，均可立即指哪认哪；间或打疙楞，一复唱，立即复活活恰。这一禀赋让我大感意外和佩服！那时，住家弄口有《大公报》贴报栏。我路过常瞅上几眼。于是，“去投稿”的念头油然而生。

真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来劲，不掂斤两，不揣深浅，把《大公报》与弄口屈委的黑板报等量齐观了：人家骆宾王七虚岁就写出色彩、音响、动静俱佳的《咏鹅》，我都读五年级了，还畏葸收手？于是，裁下几页练习本，拟了几个堪作硕博论文的弹眼落睛的标题：“论歌唱识字教学法”。一起笔，即信马由缰、滔滔不绝、“文思泉涌”：由介绍家庭成员而就学校和师长，而胞妹才艺及伯乐者我的发现始末，而我对此法的功利效应的预期。我在闷热的阁楼小窗伏案奋笔，写了满满五大页！“雄文”寄出后，每天凝神于大名以铅印形式“突敬”。

一周许收到一封肥硕的印有报名的信。急急拆阅，抽出便笺，是一封毛笔书写，字迹工整的信，虽寥寥几行，因为那是人生首获之鱼腹，因而历久如新：黄柏生小朋友：你的来稿，我们看了，谢谢惠赐，你来稿中提到的歌唱识字教学法很新鲜。如果你有实际教学经验，欢迎整理后再寄来。我们再议。此复。……

读完，立即将这温文和气和、绵里藏



陈从周先生的书画

张香还先生在他的《音容宛在漫忆》一文（《文汇报书报》5月28日）中，忆及沈从文当时对素材平等的他的来稿中书写及个别措辞问题给予诚挚精辟的点拨，以及文章发表后又进一步帮扶的身受，令我唏嘘不已！

然而，往昔岁月的编辑、陈从文般循循善诱、“溢出”指导外，还真不缺乏气定神闲、敬业尽职者。一例：六十多年前，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发觉读一年级的胞妹殊有才华——所有她能吟唱的歌曲中的字词，不论出处，均可立即指哪认哪；间或打疙楞，一复唱，立即复活活恰。这一禀赋让我大感意外和佩服！那时，住家弄口有《大公报》贴报栏。我路过常瞅上几眼。于是，“去投稿”的念头油然而生。

真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来劲，不掂斤两，不揣深浅，把《大公报》与弄口屈委的黑板报等量齐观了：人家骆宾王七虚岁就写出色彩、音响、动静俱佳的《咏鹅》，我都读五年级了，还畏葸收手？于是，裁下几页练习本，拟了几个堪作硕博论文的弹眼落睛的标题：“论歌唱识字教学法”。一起笔，即信马由缰、滔滔不绝、“文思泉涌”：由介绍家庭成员而就学校和师长，而胞妹才艺及伯乐者我的发现始末，而我对此法的功利效应的预期。我在闷热的阁楼小窗伏案奋笔，写了满满五大页！“雄文”寄出后，每天凝神于大名以铅印形式“突敬”。

一周许收到一封肥硕的印有报名的信。急急拆阅，抽出便笺，是一封毛笔书写，字迹工整的信，虽寥寥几行，因为那是人生首获之鱼腹，因而历久如新：黄柏生小朋友：你的来稿，我们看了，谢谢惠赐，你来稿中提到的歌唱识字教学法很新鲜。如果你有实际教学经验，欢迎整理后再寄来。我们再议。此复。……

读完，立即将这温文和气和、绵里藏

投稿轶事

黄柏生

针、滴水不漏的“商榷”噎住了！我抓耳挠腮：天涯海角仅此一珍闻，我素无乐感、五音不全、小学尚未破茧，何来教学经透？岂非强人所难？——我当时全未参透有关编辑平和礼貌、幽默调侃的真谛，只耿耿于对方的“推诿”：我这不仅仅仅缺乏“实际经验”吗？既然“新鲜”，你不可以补充修润？——何谓“愣头青”？儿时的我即鲜活一例！

如今每忆及我这“豪迈、霸气”的投稿就好好笑。不过，继而又想，那位编辑哪来这么好心态：面对稚嫩的“小八腊子”的手稿，非但没有立即塞入废纸篓，居然又“鸣谢”又“暨还”又“翰墨”以VIP待之呢？受此感召，日后我还真有实际经验了：我初中学业时一门心思考

师范，当了四十多年的语文教师，在批改学生作文时潜移默化地有样学样了！

又一例，上世纪80年代时的王安忆，亦曾为我的“稿师”。那时我常去发行量达百万份的《儿童时代》杂志社送稿串门。去时，常见王安忆小姐伏案笔耕。我在外她发了两篇儿童小说后，想上“档次”，一次顺便捎上一篇自己的近作。不久，责编王安忆退了稿，还附地奉上的便笺，在“黄老师，你好，原稿奉上”之后，即“建议您读读《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您会理解的”。年齿已长的我，鉴于茹志鹃的盛名和王安忆作品的旺发，老老实实去读了苏联著名儿童文学家诺索夫的多篇儿童小说。

这一读，令我完全泄气。理想很丰满，现实太残酷，差距太大了！怪不得王小小姐不予置评，我那篇近作不是一篇《论歌唱识字教学法》？老子说“自胜者强”，我还算有自知之明，后来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偃旗息鼓了，没有硬着头皮写下去。

和张香还先生一样，我也从投稿中得师之“传道”点拨，豁然开朗，受益匪浅。